



国家出版基金项目
NATIONAL PUBLICATION FOUNDATION



社会工作
流派译库

建构性社会工作： 迈向一个新的实践

[英] Nigel Parton Patrick O'Byrne 著
梁 昆 译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EAST CHINA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 PRESS

Constructive
Social Work:
Towards
a New Practice



建构性社会工作：迈向一个新的实践

Constructive Social Work : Towards a New Practice

[英] Nigel Parton

Patrick O'Byrne 著

梁 昆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建构性社会工作: 迈向一个新的实践 / [英] Nigel
parton, Patrick O'Byrne 著; 梁昆译. —上海: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 2013. 12
(社会工作流派译库)
ISBN 978 - 7 - 5628 - 3766 - 4

I. ①建… II. ①Nigel… ②Patrick… ③梁…
III. ①建构主义-社会工作-研究 IV. ①C916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3) 第 295788 号

Copyright © 1995 by Palgrave Publishers Ltd.
中文简体版权由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独家拥有。

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9 - 2013 - 614 号

社会工作流派译库

建构性社会工作: 迈向一个新的实践

著

译

项目

责任编辑

整体设计: 袁银昌设计工作室



出版发行: 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

地 址: 上海市梅陇路 130 号 200237

电 话: (021)64250306(营销部) (021)64253797(编辑室)

网 址: press.ecust.edu.cn

印 刷: 上海中华商务联合印刷有限公司

开 本: 710 mm × 1000 mm 1/16

印 张: 14.75

字 数: 231 千字

版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版

印 次: 2013 年 12 月第 1 次

书 号: ISBN 978 - 7 - 5628 - 3766 - 4

定 价: 46.00 元

联系我们: 电子邮箱 press@ecust.edu.cn

官方微博 e.weibo.com/ecustpress

淘宝官网 <http://shop61951206.taobao.com>



译库学术顾问委员会

译库顾问

钱旭红 华东理工大学校长、院士
柳拯 民政部社会工作司司长
郑杭生 中国人民大学一级教授
曹锦清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译库学术委员会名单(以姓氏笔画为序)

Ira Cobly 美国休斯敦大学(University of Houston)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Jack Richman 美国北卡大学(UNC at Chapel Hill)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John Carpenter 英国布里斯托尔大学(University of Bristol)社会工作教授
Lena Dominelli 英国杜伦大学(Durham University)社会工作教授
Patrick O'Leary 澳大利亚格里菲斯大学(Griffith University)社会工作学院院长、教授
王思斌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会长、北京大学社会学系教授
阮曾媛琪 国际社会工作教育联盟(IASSW)前主席、香港理工大学副校长、教授
何雪松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副院长、社会工作系教授
宋林飞 中国社会学会会长、江苏省人民政府参事室主任
陈丽云 香港大学社会工作与社会行政学系主任、教授
范斌 华东理工大学社会工作系主任、教授
徐永祥 中国社会工作教育协会副会长、华东理工大学社会与公共管理学院院长、教授

编辑委员会

主 编 徐永祥
执行主编 何雪松
委 员 范斌 张昱 朱眉华 费梅苹 曾守锤 赵环 王瑞鸿

这是我们与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合作的第二套译著丛书。本世纪初，我们所推出的18种一套上海市重点图书“社会工作名著译丛”获得了学术界的热烈反响和高度认同。本套译库与以往不同的是，更加聚焦于介绍西方社会工作的理论流派，但又不局限于理论流派的译介。西方的社会工作历经一百多年的发展，已经形成了诸多视角、理论、模式与方法。知识转移与全球共享是当代社会工作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熟知并批判性地借鉴西方社会工作理论，对于建构兼具国际规范与中国特色的社会工作理论、制度、实务模式，无不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唯其如此，中国社会工作学界才有可能参与全球专业知识库的建构，以推动国际社会的公平与正义。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工作的制度设计与发展经验具有本土的特点，不能简单地照搬西方的理论框架去加以解释。这就要求我们，在学习借鉴西方社会工作专业知识的同时，应警惕本国专业共同体因理论的“不自觉”“不自信”而在全球知识界处于失语状态。因此，必须立足和扎根于我国社会体制改革、新社会组织、新社会服务和现代社会工作制度建构的实践，积极进行中国社会工作的理论建构与知识创新。唯其如此，中国的社会工作学界才有能力提升在全球的话语权，从而为全球社会工作贡献中国的力量。

衷心希望本套译库能为中国社会工作的发展提供新的知识支持，以进一步推动国内的社会工作理论研究 with 知识建构。须知，没有系统强劲的社会工作理论的科学支撑，就不可能有系统强劲的社会工作发展实践。

本套译库的出版得到了国家出版基金的大力资助，为此我的感谢与感激之情难以言表！这里，我还要向所有参与翻译本套译库的同仁表示感谢，因为他们的奉献体现了社工学人的专业精神！感谢华东理工大学出版社，因为他们始终对我们充分信任及对社会工作学科建设鼎力支持！我还要特别感谢何雪松教授，因为他持之以恒的追求、坚持和奉献，我们才有了本套译库的中文版！

是为序。

华东理工大学中国社会工作研究中心

徐永祥

致 谢

在本书的写作过程中，许多人给予了帮助并对此项目做出了贡献：有些人通过分享经历；有些人通过讨论想法；有些人通过阅读并批判性地评论我们刚完成的初稿章节；还有些人通过提供实际及感情支持。我们特别感激 Trevor Butt、Linda Davies、Brid Featherstone、Linda Halliwell、Sue Hanson、Chris Hall、Bill Jordan、Judith Milner、Trish Morris、Mary O'Byrne、Chris Parton 以及 Barbara Pellymounter。当然，我们知道他们当中有些人——即便不是全部——不会乐于见到此书，并会觉得我们过于强调一些议题和主题以致顾此失彼。因此，和以往一样，我们对书中的内容承担全部责任。

Nigel Parton, Patrick O'Byrne

前 言

我们写作此书的动机与兴趣是多方面的。我们的一个主要关注点是：我们愈发觉得社会工作，特别是在英国，迷失了方向。尤其是我们注意到，社会工作无论是从我们所想的角度还是从我们所做的角度来看，都已经变得非常保守，过度程序化，以及狭隘地关注评估、管理及预防风险。过去的二十五年，仍旧是在英国，见证了一波又一波的批评、公众咨询及媒体责难。这将管理者和实务人员——主要是法定部门的——都置于聚光灯之下。在 20 世纪 90 年代，这些发展甚至有愈演愈烈之势。我们看到了更为复杂的尝试，其目的在于使社工负起责任，并让他们的实务接受比以往更为详尽的复核、检查、审计以及来自管理层的监督与指导。

我们并非从原则上抗拒这些发展，因为显而易见，他们代表了为服务使用者改进质量和增加一致性的认真尝试。而根据定义，服务使用者可能是社会上一些最无力和脆弱的人。尽管如此，在我们看来，这些变化在本质上具有自上而下的性质，并且几乎未曾详细地了解实务的性质和现实。更具体地说，我们关注的是这些变化的性质增加了对实务者和使用者的组织需求。

结果是越来越少的时间花在对使用者或案主的直接工作上，特别是倾听他们的关注，同他们一起谈论可以做些什么。这就好似社会工作正在变成几乎是“非社会的”。这些试图将社会工作变得越来越理性和可以预见的做法，正带来一种（很可能是非预期的）后果，将社会工作从其独特之处及构成其主要优

势的基本要素上偏离。

传统上，社工的专长建立在这些能力之上：知道如何同各种各样的人建立关系；为了资源调查环境，并为案主汇聚资源；与不同的个人、群体及组织进行协商，并调动他们的能量；进入其他有意义的世界以便提供帮助。然而，社工日益承担起组织行政人员的角色。这种情况的出现部分是由于引入了购买方-提供方相分离的做法以及照顾管理者角色的出现。但是这并非唯一的原因，因为这项工作的整体背景和原则都发生了重大变化。不过，有助于实务者并努力直接影响实务的理论取向未能得到发展，特别是那些明确关注语言和对话的取向，以及那些处于实务核心位置并使其与众不同的取向。

这将我们带到我们的第二大类的动机，因为与此同时，我们已经开始意识到一种日益浓厚的对社会理论和人文科学的求知兴趣：宽泛地说，涉及有关社会建构主义、后现代性的众多理论进展；具体来说，涉及语言和叙事在理解社会世界和人的本质中的中心性。尽管这些视角已被用于指导对社会工作和社工的基于研究的分析，他们极少被用来针对实务发展概念和见解。这是我们在确立的首要任务，也是我们在发展一种具有创新性和挑战性的实务方法过程中的首要任务。我们将这种实务方法称之为“建构性社会工作”。

建构性社会工作强调过程、多元化的知识与声音、可能性以及知识的关系特性。它赖以前行的假设是：使用者，无论是处于何种状况，自身和周围拥有重要的资源；但是这些资源的储存方式却是打开新的、更多的积极可能性的关键。由于社工是这一过程中的专家，他们能够帮助人们关注这些资源，以便最好地协助他们达成他们的目标和重写他们的状况。假定社工不知道什么是最好的以及该做什么，因而与过程和结果中的模糊性和不确定性一起工作的能力成为关键。不确定性原则暗示了社会情境呈现中的流动、循环及不确定性；总体而言，生活充满了可能性，而且语言上的社会纽带常常比设想的那样更易变化。

建构性社会工作认为，社会工作即便不是一门艺术，也至少是一半艺术一半科学；它的出发点是：社会工作最好被称之为一种“道德实践活动”而不是一种“工具理性活动”；试图增进现实主义和客观主义的做法有误导之嫌。尽管如此，我们并不拘泥于只谈道德或执着于道德虚无，而是要更加明确地指出

道德选择和责任，这对社会工作实务来说至关重要。

我们所发展的“建构性”方法是肯定性的和反思性的，并且聚焦于对话，倾听他人和与他人谈话。它致力于揭示悖论、迷思和谜团，通过展示、提醒、暗示和唤起而非通过应用知识和接近真实去说服。关注的焦点是叙述和不同的故事，以至社会工作有时可以扮演成具有说服力的小说或诗歌。在勾画这一取向时，我们认识到它与社工涉足的所有情况、角色和任务都有关系。它暗示了向经理、法院、其他机构、社区团体及各类社会网络展示专业自我的十分新颖的做法。这一取向挑战了许多我们习以为常的假定，以及我们在各个方面的所思所做。因此，这是努力发展建构和叙述取向的更为宏大的工程的一部分。尽管如此，我们此处主要的关注点是与案主和使用者直接的面对面的互动和工作。我们之所以这么做，有许多原因。

首先，在我们看来，过去的二十年忽视了发展和提炼关于“做什么”以及“如何与案主相关”的详细知识。虽然我们觉得社工花在直接与案主面对面工作的时间所占的比例正在降低，这种工作仍是这一行业的核心。这是实务之所以成为“实务”的关键，也是区分实务者与他人的关键。因此，我们的观点是，如果我们能够展示建构性社会工作在面向服务者的直接实务领域内的相关性和创造性，它将作为催化剂鼓励其他人在其他比较相关的领域的发展用途。

但其次，它还反映了我们自己的兴趣和经验。我们当中的一位 (Nigel Parton) 最初作为一名社工在一家地方政府的社会服务部门工作，并在 20 世纪 80 年代期间，以名誉的兼职社会服务值日主任的身份继续工作。最近几年，他同许多社区自治组织一起工作，并成为了一名监护人。因此，他具有处于社会工作接收方的直接经验。在过去二十年间，他在儿童福利和儿童保护等广泛的领域从事写作及研究，而且一直有兴趣使用和应用从社会理论到社会工作的理念。与之相反，Patrick O'Byrne 很晚才投身社会工作，在此之前，他在南爱尔兰长大，然后作为一名牧师在英格兰东北部生活了 11 年。在过去二十年里，他同样也对家庭治疗产生了兴趣并投身实践，而且最近还对调解产生了兴趣。他特别感兴趣的是：基于寻解导向和叙述实践的理念，努力发展增权的方法，同服务使用者一起为其带来改变。

在过去二十年间，我们在哈德斯菲尔德大学一起共事，主要从事有关社工专业培训方面的工作，开始是通过社会工作资格证书（CQSW），最近是通过社会工作文凭（DipSW）。虽然来自不同的专业背景，而且有着不同的兴趣，但我们都对理论与实践之间的关系抱有共同的、持续的兴趣。具体来说，我们都对建构主义、叙事以及后现代取向感兴趣，并有志于在新千年之初发展和展示他们与社会工作实务的相关性。这激励着我们前行。

这本书的编排是这样的：尽管立足于理论，我们阐述具有创造性和创新性的实务方法的总体目标是明确的。第一章概括了我们所说的建构性社会工作究竟何意，并批判地讨论了与社会建构主义相关的视角，以及那些在我们看来为该方法提供了一些重要理论框架的视角。第二章关注了与社会工作理论的实质有关的争论，特别是关于理论与实践的关系的争论。它认为，这些争论及争论的形式都深受不断变化的社会和政治背景的影响，对当前发展建构主义和叙事取向的实务具有重要意义。第三章和第四章详细地阐述了我们认为可以指导建构性社会工作及其未来改进的关键性理论取向。

第五章和第六章明确地涉及展示如何在实务中使用这些方法。第五章借助并发展了那些在治疗及咨询中常用的与叙事理念相关的方法，特别借鉴了White、Epston和O'Hanlon的工作。第六章批判地讨论了Shazer、Berg及其他一些人在寻解导向上的工作。接下来，第七章提供了两个篇幅较长且来自实务的个案研究，以便说明在主流社会工作中如何利用这些方法。随后，第八章批判地讨论了如何从建构的角度开展对多数社会工作活动都至关重要的评估。

第九章有两个主要目的：其一是总结及批判地讨论许多关于叙事和寻解导向实务的研究；其二是考虑这些方法在多大程度上能够做到性别敏感。最后一章尝试去总结我们所认为的建构性社会工作的关键特征，然而它处理一些基本议题的方式可能会招致一些评论者的批评，认为它未能认识到客观性和现实的重要性，以及内在的道德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我们认为，这一方法在上述各点上都不应招致批评，事实上，它有助于重新发现社会工作近年来丢失的核心价值和优势。

目

录

致谢	1
前言	1
第一章 我们所说的“建构性社会工作”究竟何意?	1
第二章 当代社会工作的本质及其知识基础	21
第三章 建构性社会工作的一些理论取向	39
第四章 迈向建构性实务的进一步定位	57
第五章 抗拒的艺术	75
第六章 为可能性而训练	91
第七章 建构性社会工作:两个实践案例	113
第八章 建构性评估	129
第九章 它奏效吗?	147
第十章 结论:建构性社会工作的一些核心议题	167
附录 1: 学生优势量表(针对在学儿童)	183
附录 2: 安全迹象量表	187
附录 3: 不当教养方式的残存量表	189
附录 4: 受虐后开始新生活的恢复量表	191
附录 5: 吸毒后重塑生活量表	193
扩展阅读	195
参考文献	201
译后记	221
内容提要	222

第
一
章

我们所说的“建构性社会工作”究竟何意？

好奇心。对我来说，它唤起了“关注”；它唤起了存在和可能存在的关心；一种发现我们周围奇怪之处的意愿；某种脱离我们熟悉感的冷酷；一种掌控什么在发生以及发生了什么的热情；一种对重要且关键的传统等级的蔑视(Foucault, 1989: 198)。

导 言

本开篇的核心目标是双重的：其一，概括我们所说的建构性社会工作究竟何意，以及我们认为它的核心要素；其二，讨论那些与建构主义相关，且在我们看来，能为发展该实务方法提供重要理论框架的视角。在做这些之前，我们概括了为何我们觉得目前从事这项工作具有重要意义。为什么我们现在需要社会工作实务的建构性方法呢？

尽管我们认为，英国的社会工作正处于“危机”之中这种说法夸大其词(Clarke, 1993)，但毫无疑问的是，近年来，社会工作经受了相当多的批评，它在当前正经历着重大的改变与重构(Parson, 1996; Parson, 1998a)，在白皮书《社会服务的现代化》(1998)发表之后，这一过程可能会持续到新千年。特别是实务工作者似乎正经受着一系列越来越详尽的程序、目标、成效测量及管理层的监督，这些东西损害了他们的专业技能和士气。正如我们其中之一在其他地方认为的那样：“越来越感觉到，社会工作好似缺少核心的理论知识基础，这项事业的中心好像有一个洞”(Parson, 1994b: 30)。近年来，在阐述和发展实务概念与理论方面是失败的，这不仅对实务工作者，而且更重要的是，对那些与他们一起工作的人造成了一种相当大的伤害。特别是我们未能立足于一系列洞见和概念之上，这些洞见和概念则是来自先前对社会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详细分析。在本书中，我们的中心目标是帮助实务工作者和社会工作学界(重新)重视对在工作者和服务使用者之间富有意义的语言和叙述进行详细和批判性分析的重要性，并为工作者提供使用叙述建构改变的方式。这种(重新)定位是当务之急。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虽然

有各种呼吁，例如，在白皮书《社会服务的现代化》（1998）中，有针对实务工作者的“以使用者为中心”，有伙伴关系、增权及促进自主性，但是却鲜有线索帮助实务工作者获取这些呼吁所要求的技能以及可资利用的知识和理论。

这一工作的重要性在 Olive Stevenson 最近的反思中得以体现，她反思了自 1948 年儿童法以来，英格兰和威尔士五十年间的儿童福利实务。尽管我们对她的分析持有一些重大的保留意见，但是我们觉得她所关注的议题非常重要。

社会服务的重组、培训的扩展、社会评论的影响日益显著以及对社会政策更广泛议题的日益关注，这些在 Stevenson 看来，都造成了大家不再热衷于在社会工作课程中运用心理动力学理论：“20 世纪 60 年代是衰落的开始；不但有‘过多’的理解方式提供给未来的社会工作者，而且它们常常在日常工作中未能得到充分应用，有时还被伪装成理性批判的口吻讲授为不利于社工事业”（Stevenson, 1998b: 84-85）。她认为，心理动力学理论的边缘化和普遍性破坏导致了一个重大问题——“未能为社会工作发展出固有的、一致的实务理论”（Stevenson, 1998a: 156, 加注），自此以后，这一问题不仅困扰着培训，也困扰着实务。特别值得一提且与我们此处的目的直接相关的是，她认为：“并不夸张的是，对意义的追寻在 1960 年代开始减少并至今仍困扰大家，与此同时，综合性评估可能缺乏理论内涵”（Stevenson, 1998b: 84, 原注）。尽管现有的理论有所增加（参见，例如，Howe, 1987; Payne, 1997; Adams, Dominelli and Payne, 1998），对 Stevenson 而言，这一问题“仍旧如同在 1960 和 1970 年代一样，即：如何促使社会工作者选择、应用及整合理论，以便他们在处理儿童福利工作时更具目的性”（Stevenson, 1998b: 93）。

然而，我们会说，对社会工作的变化的解释，特别是它如何在国家机构中得以实践，远比 Stevenson 所允许的那样更为复杂，并且不足以重挑战后的“黄金时代”。不过，重要之处在于，她所指出的近年来在实务发展理论上的失败，在某种程度上象征着社会工作的处境。好像是社会工作者被安排以一种本质上属于官僚式的方法处理需要，并将人类的不幸置于风险与脆弱的类别之中。正如 David Howe (1992, 1996) 所说，社会工作已经变得合法化和程序化了，手册、指引以及责任条例以一种机械式的方式执行，几乎到了在处理人际关系上排斥一切创新或技巧的程度。如同我们

将在下一章指出的那样，存在着一种未能认识到社会工作复杂性的失败。不过，我们认为，这些未能发展出对实践有益且相关的理论的失败，既是不不断变化的社会工作本质的结果，也同样是其原因。

最近的几年见证了重新出现的有志于在早期心理动力学和自我心理取向上发展理论的兴趣，例如，发展社会心理关系为本的理论和增进对依附之于社会工作的理解(Howe, 1995a; Howe, 1997; Howe, 1998; Howe & Hinings, 1995; Howe, Brandon, Hinings & Schofield, 1999)。这并非我们此处的目的所在，但是在很多方面，Stevenson 过于漠视某些发展，特别是在 20 世纪 70 年代及 80 年代早期，许多作者尝试超越心理动力学取向。我们可以看到，那些与互动论、标签和变异理论，特别是与 Erving Goffman (1968a, 1968b, 1971), Ronald Laing (1965, 1971; Laing and Esterson, 1970)的著作和社会工作激进运动的新马克思主义有关的想法，其影响对社会工作来说远非消极和敌意，究其原因，是从事助人的实务工作者看到，不但他们的干预受到各种各样的社会和政治因素的影响，而且社会工作干预也未必符合案主的利益。到了 20 世纪 80 和 90 年代，人们日益认识到性、性别、种族、残疾、年龄及社会阶层作为排斥、压迫和歧视的关键因素的重要性，也逐渐认识到社会工作者可以在开展反歧视和增权的实务中起到关键性作用的事实(Thompson, 1997, 1998)。

在 20 世纪七八十年代的其他作品中还可以看到，案主与工作者之间在人际关系的、细节的层面上进行的交换发生了什么，以及在此过程中，又有什么超越了与基于心理动力学取向的传统个案工作模式相关的问题。它们强调了努力去理解人们如何理解日常经验，以及这如何影响他们对他人的所做所感的重要性。明确将“以案主为中心”的视角发展起来，试图清楚地阐述社会工作的助人艺术(Jordan, 1970, 1972, 1979; Brandon & Jordan, 1979; Wilkes, 1981; England, 1986)，并强调自我的使用、关系的性质和质量、经验的理解、意义的追寻、沟通的重要性、社会工作者与案主之间关系的交互性以及语言理解和使用的中心性。从根本上说，写本书是由于未能发展出简洁、明确的理论模型。尽管如此，正是在此基础上，才有可能为实践发展出理论。在许多方面，正是从这一传统出发，才可以看到我们在此所尝试发展的理论的最清楚的联系和根源。不幸的是，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中期以来，这一传统几乎从文献中消失了。这一取向的核心是，试图帮助服务使用者认识和理解他们自身，并且为意义和经验的认知